

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,我带儿子去俄罗斯旅游,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,我们观看了经典的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。

入场,坐定。儿子左右看看,忽然轻声说:“爸,我可能看不懂。”

那是儿子第一次看芭蕾舞。我自己对芭蕾舞也所知甚少,看过的芭蕾舞剧更是屈指可数,不过,在出国前,我就做了攻略,恶补了一些芭蕾舞知识,也详细了解了《天鹅湖》的剧情,自付应该能够基本看懂它了。而我之所以做这些准备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应付儿子。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,我努力让自己的知识储备跟得上他,在儿子问你为什么时,不露怯,至少不要一问三不知。我承认,也有很多时候,在儿子连珠炮般的问题面前,我会被问得愣怔,最后,只好胡乱应付,好在儿子年幼,好打发。

但这次,我是有备而

那天,天气晴好。忙了大半年的我,终于可以跟着朋友去看芦花了。一路顺畅,记忆中遥远的崇明,现在竟然近得不可思议,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朋友说,你三十年来,崇明早变了!

真的,三十多年没来了。那年,我计划一年内遍

走上海每个区县去讲陶行知,最后只有崇明还没去。那时去崇明非常困难,当天回不来,如天气不好,两三天也不一定回沪。因讲课排得很满,如不能按时回来,会引起一系列麻烦事。但遍走上海不能漏了崇明,已近年底,再难还是要去。

为确保周一能回来,我决定周日去。六时出门,换三辆公交到了宝杨码头。船刚开走,等一个小时才来了另一班船。船悠悠地晃,到陈家镇已是下午。那时没手机,走出码头没看到人接,只好干等。好不容易等到了人,骑着自行车让我坐,幸好我不怕坐“老坦克”。到了一所中学的宿舍,我又饥又困,没吃几口饭,倒头就睡着了。

醒来天已黑,有人敲门,教育局领导来陪我吃饭。那晚吃些什么早忘了,只记得米酒,味道真好。

晚上睡在宿舍,只觉冷,风从窗、门缝钻进来,声音像狼叫似的。崇明的冷是渗到骨髓里的寒,盖了两床被也没用。我两脚冰冷,浑身发抖,辗转反侧。好不容易捱到天亮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下次再也不来了!

为让我当天可回沪,讲课从八时开始。全县骨干教师一大早骑自行车从各镇赶来。看着头上冒热气的老师们,浑身不适的我忘记了昨夜的失眠,精神十足地讲了两个多小时。崇明师范刘校长递了纸条,上面写着,请您为未来的老师鼓劲!那年月,只要有别的路走,没人肯当老师,给师范生讲“陶行知”我从不推辞。刘校长借了一辆车,讲课结束即去了学校。我看到全校师生都等在礼堂,饿着肚子直接上了讲台。

我不记得那天怎么回的上海,只记得崇明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似的;还记得下讲台时,头晕得差点摔跤;再有,等船、倒几辆车的精疲力尽。崇明之行,给我留下的记忆,是累惨了。从那以后,再没去过崇明。近年有朋友请我去农家乐,还是拒绝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一次都没敢再去。

今天,我来了。沿着西沙湿地的木栈道走,两旁的芦苇静静地望着我。更多的芦苇守护着江堤,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,互相缠绕、相依相偎,坚不可摧,弯而不折腰。

云慢慢地移,鸟轻轻地吟,风轻柔地拂在脸上,崇明竟变得如此之美!我的眼里一片灼热。我又看见了,那天师范生送我时渴望的目光,听见他们说,叶老师,你一定不要再来了。崇明师范早就没有,但成千上万的崇明人,如同坚韧的芦苇,年复一年,不离不弃,终于为家乡描绘了最美的画,谱写了回肠荡气的诗。而我,只有遗憾。崇明,我来迟了。

七夕会

一日朋友请客,地点在一家装修颇为考究的餐厅。点菜时,菜单上的一道“玉盘黄瓜”引起了我的兴趣,一看图片,发现不就是拍黄瓜嘛!

夏季的乡村里,随处可见黄瓜的身影。房前屋后、小路边、田埂旁,甚至阳台上都有一株或者几株攀爬的藤蔓,努力地舒枝展叶。不过,乡亲们只是把种黄瓜当成一种点缀,为了合理利用土地的“边角料”,自然也不用专门打理,更不必担心狂风暴雨,任由它们自由生长就行了。

黄瓜长得野蛮,乡亲们的吃法也很粗犷。黄瓜长到两扎

我会很小声的,不会影响到别人。”儿子却坚决地再次摇摇头。我还想说服他,剧院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,大幕徐徐拉开,演出开始了。

湖畔,采花的奥杰塔公主,被凶恶的魔王罗斯巴特施以恶毒咒语,变成了天鹅。只有在晚上,她才能变回人形。而要破除这邪恶魔法,只能靠坚贞的爱情。舞者通过翩翩舞姿,叙述着这个悲情的故事。

我想给儿子解释这段舞蹈代表的含义。但看见他神情专注地看着舞台,我忍住了。

最经典的是四小天鹅舞一幕。在欢快活泼的音乐节奏中,四只小天鹅,演绎着湖畔轻松、快乐、惬意的嬉戏场景。我想告诉儿子,这四只小天鹅,都是像奥杰塔公主一样,因被恶魔法咒咒而变成了天鹅的小公主们。儿子见我说话,将食指竖到嘴边,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动作。我将到了嘴边的话,又咽了回去。

两个半小时的演出,我没有跟儿子讲解一句,而儿子,自始至终,也没有问过我一个

问题。从剧院走出来,我问



乐观主义者

孙宝成(编译)

面对半瓶水,悲观主义者看到的一半是空的,而乐观主义者则看到的一半是满的——这类说明悲观和乐观主义者间差别的绝妙比喻并不鲜见,而英国作家弗朗西斯·盖伊却很欣赏这则寓言:有两只青蛙同时掉进了牛奶桶,面临淹死的危险。它们转圈游了一会儿,根本无法出去,一点希望都没有。于是,悲观的青蛙便沉到桶底,淹死了。可乐观的青蛙不停地游,直到再也游不动为止。忽然,它发现自己坐在了黄油块上,原来是在它不断的搅动下,从牛奶中制造出了黄油。

乐观也好,悲观也罢,在平平安安的日子里或许影响不大。但是,在灾难降临、绝望无援的时刻,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结果就大相径庭了。

长,两根手指粗细,这时候是最好吃的,顶花带刺地摘下,洗干净——或者直接往衣服上蹭几下,就可以开吃了。黄瓜脆嫩、清甜,汁水丰富,好吃又解渴。手握黄瓜送往嘴边“咔嚓”一口咬下,然后大口大口地嚼着。

在乡下,这是最常见的吃法。这种接地气的市俗姿态,是乡亲们表达对黄瓜喜爱的最好方式。在北方一些地区,黄瓜蘸酱早已成为一道家常小菜。虽然同样是生吃,加了“蘸酱”这道工序,黄瓜勉强算是被认真对待了,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。

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拍黄瓜。黄瓜瓜皮清香、略带韧劲,

儿子:“看懂了吗?”儿子摇摇头:“不太懂。但我听出来了,音乐很美;我也看到了,芭蕾舞演员们的舞姿很美;而且,我还想象并感受到了王子和公主爱情的

美好。”

儿子的话,让我惊讶不已。这个懵懂的少年,第一次完全靠自己,感受了一次艺术的熏陶。很显然,他还不能解读、欣赏每一个舞姿、动作、细节和音乐的意义,对很多剧情也不甚了了,甚至都没能看懂一个完整的故事,但是,他用自己的想象,凭自己的感受和本能的愿望,将它们补充完整。

他不懂,或者还不是

很懂,有什么关系呢?今天,他眼中的天鹅湖,就是一个少年版的《天鹅湖》,一个懵懂而凄美的少年派爱情故事,就像他刚刚起步的青春一样。我相信,若干年后,如果他再看《天鹅湖》,他一定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。

而就算我们长大了,见过了更多的世面,经受了更多的历练,我们也未必能将这世界,将我们的人生完全看懂看透。也许,看不懂的地方,用我们的想象去填充、弥补、修正,艺术才更具魅力,生活才更加绚烂,人生才更趋完美吧。

玉盘黄瓜

俊彦

瓜是最家常的。

我最喜欢吃的是奶奶做的拍黄瓜。奶奶将刚从园子里摘来的黄瓜洗净,放在案板上,手起刀落,只听“啪啪”两声,表面看来依旧完整的黄瓜实则已经布满了裂纹。再把黄瓜切成小块,如果仔细看,可以看到,每

1959年,我所在的驻藏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西藏民主改革运动,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,前往林周地区白定乡工作组。

一天早晨,我的房东曲珍连哭带喊地跑来说:“不得了啦,墙塌了……强巴曲吉的孩子压在下面啦!”我立马飞奔到现场,只见强巴正抱着五岁的孩子普布嚎啕大哭,我拨开人群,不由大吃一惊,普布的前额被砸得凹陷下去,双眼紧闭,气息奄奄。周围的群众有的双手合十祷告,有的低头诵经祈求,更多的人急得哭泣。我即让农会干部准备两匹快马,一匹由我骑到县医院,让医生赶紧做好抢救准备。另一匹由强巴抱着孩子骑上赶来。两个多小时的路,我一个小时就赶到了。但孩子到医院已七孔出血,医生说:“怕是没希望了,你们还是赶紧去条件更好的澎波农场试试吧。”

这时已近黄昏,气温骤降,我又策马飞奔,大腿内侧和臀部都磨出了血,却依旧不敢减速,总算在下午六点左右赶到农场。孩子的脸已呈青灰色,呼吸微弱,医生虽在全力抢救,但告诉我希望不大了。如果还要试试,只有送拉萨解放军总医



七彩映红土

(摄影) 苏正义

体检查出患有高血压,每个星期要去医院开——奥美沙坦脂片5盒。打开盒子发现,一板吸塑片装7片奥美药片。每片像纽扣那么大,为了减少体积,我索性拆包将5片药物装入一个盒子里。多余的四只盒子就成了生活垃圾,被扔进了干垃圾箱。

笔者遐想,我们的药厂换个思路,将奥美药片装入药瓶,每50片或百片一瓶,这样就方便了病家,节省了原材料。在当今垃

圾分类的情况下,扼止或产生生活垃圾的源头,何乐而不为呢?奥美药片包装如此,其他药物的虚火包装也不在少数,不知有多少生活垃圾产生。

以此类推,市面上不少食品包装,多是体内容少,包装盒大,可食品内容少,这样人为地制造出了许多生活垃圾,且浪费了许多资源。要想搞好垃圾分类,需全民重视人人参与。诸如药品包装、食品包装等各行各业,可以设计一些简洁实用的包装盒。从源头上扼制和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,为垃圾分类助一臂之力。

院。可这里没有车,骑马需要一天多时间。“还有近路吗?”我心存侥幸地问。医生指着远处积雪的大山说:“翻过这座山,只要四小时,但夜里翻山是不可能的。”我跨出门外,极目之处矗立的那座大山,高峻险拔,别说带个重伤的孩子,就是轻装上山,

阿妈书记啦

赵邦玲

也极危险。可此时,我只有去冒险了。我请求医生维持好孩子的生命,便催马出发。我打算在夜里一点到医院,然后搞辆车开回来接孩子。这样,天亮前可以将孩子送到医院。

黑夜吞噬着莽莽大山和我。深山里卷过来的风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野兽嚎叫声让人毛骨悚然。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山顶,可我的坐骑突然昂首嘶鸣,几乎垂直站立起来,待马转身跃开,我才发现,自己正站在一条悬崖边缘,不由吓出一身冷汗。刚打马离开,又发现迷路了,登上一座山头,是绝壁,调转马头下到山坳,又登上一座山头,仍旧没路。我在山里团团转,怎么也绕不出去。而马此时也累坏了,倒在地上喘着粗气,再也不肯往前移动。

我将马拴到一块巨石上,开始徒手攀援,连滚带爬地走。不知过了多久,终于来到一个坝子。一个年轻女子半夜进村,危险随时存在。我将长发塞进军帽,擦干脸上的血迹,捡了块石头拿在手上,大步向村子走去。总算在村里找到一位藏族青年愿为我领路上山,在山

上找到了我的马。这时,马已不能再骑,我只有攥着马尾跌跌撞撞继续下

山。天渐渐亮了,我惊讶地发现,自己竟又转回昨晚出发的医院门前。好在天亮了,我们马上带着孩子赶到公路上拦车,终于将已经深度昏迷的普布送到总院抢救,孩子最终活了下来。我回到白定乡那天,正逢村里召开村民大会,得知此消息,藏民们载歌载舞,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。一个月后,普布出院了,见到我立即挣脱爸爸的手,大喊着“阿妈书记啦”,过来紧紧抱着我。这个称呼从此就跟着我了。

1994年,我重访拉萨,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白定乡看看普布。可经过35年的变迁,人们都不知道林周县有个白定乡。那天县里安排我们参观一所小学,我听完介绍又老话重提,问校长知不知道一位年轻教师说,他就是白定人。我一下转忧为喜,午饭后就赶到那里。在当年的团委书记家里,我迫不及待想见到普布,谁知陪同的校长说:“怎么不早说,他是我姐夫呀!”我们刚走进普布家,就见已成中年男子的普布从外面狂奔进来,一把将我紧紧抱住,用额头频频深情地碰我的额头,我满含热泪擦开他额前的头发,原先凹陷的额头竟没有留下痕迹。普布现在已结了婚,有了三个孩子。他说,除了找不到阿妈你以外,我什么都不缺。分手时,全村乡亲都来送我,普布哭着紧跟车子,边跑边喊:“阿妈书记啦,好好保重,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……”

我庆幸这一生能拥有这份情缘。

